

莫砺锋《白居易十讲》

深于情 长于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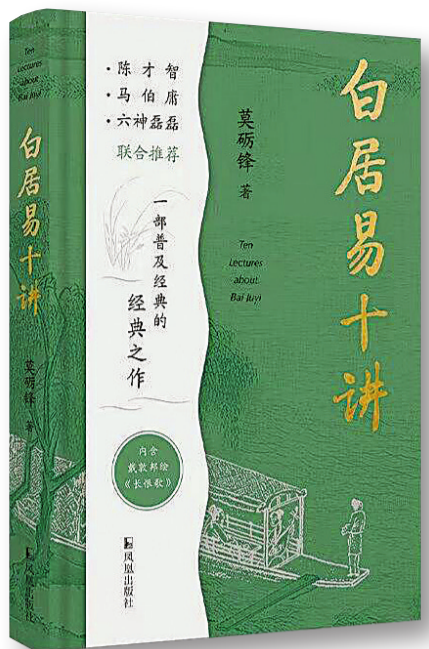
□韩元

莫砺锋先生的《白居易十讲》以白居易的生平经历为线索，循序渐进地梳理了他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轨迹，并穿插对其同期经典诗作，如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的专门解读，深入剖析了白居易对社会、仕宦与生活的态度。此外，该书还重点评述了元稹与白居易之间深厚的友谊。初读之下，这种以生平为脉络的结构似乎并无新奇之处，但要真正将白居易讲得透彻明了且不失个性，绝非易事；若再加上生动的文风要求，则更属难上加难。就好比众人对白居易名与字的认知，大多数读者或许都听过“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”的典故，但未必知晓“居易”二字出自《礼记·中庸》“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侥幸”，“乐天”则源自《周易·系辞》“乐天知命故不忧”。这些细节的补充，自然能引导读者去探寻那些看似熟悉、实则陌生的知识盲区。细读之后便会发现，该书至少有三个显著特色，值得细细品读。

文本解读的范例

该书是“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”，因此针对白居易及其文学创作中诸多专门问题，如白居易的家世、《长恨歌》中杨贵妃的册封环节，该书或仅作扼要之指引，或加以整体之概述，从而避免枝蔓，将笔墨集中在文本的解读上，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是照顾了普通的读者。作者在分析了《长恨歌》“汉皇重色思倾国”中的“汉皇重色”后，又顺便提到：“《长恨歌》后半部分写到了方士寻觅杨贵妃的魂魄一事，也与李夫人死后，汉武帝令方士寻觅李夫人的魂魄的传说有关。”这些细节与《长恨歌》的文本丝丝相扣，但是读者最容易忽略的。再比如“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”一语，后人对此学说纷纭。在有些学者看来，长生殿位于骊山的华清宫内，是一座祭祀神灵的宫殿，唐玄宗和杨贵妃不应在此互诉衷情，并且唐玄宗一般都是在天气寒冷的时候才去华清宫避寒，这与“七月七日”的时间不吻合。这种考据式的解读，往往会使“人间好诗”变得索然无味。该书从文学的角度思考，认为“谈情说爱总是絮絮叨叨，永不厌烦”，所以李、杨二人“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海誓山盟”，而不是像条约一样只签订一次。这种解读将诗歌立足于艺术之真实，而非僵硬的考据求证，从而显得更加合情合理。

再比如甘露事变发生后，正在游览香山寺的白居易在震惊之余写下了《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》一诗，该书用了足足6页进行阐释，尤其对“当君白首同归日，是我青山独往时”进行了丝丝入扣的解读。文章在解释“白首同归”指石崇、潘岳二人的金石之交后，从“同归”二字着手，分析了白居易所指绝非王涯一人，然后又从甘露事变中罹祸的贾餗、舒元舆等人与白居易的亲密关系出发，有力地驳斥了章惇所认为的“几同幸祸”的观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该书



《白居易十讲》莫砺锋著，凤凰出版社，2025年7月

在讲到白居易讽喻诗时，对唐代宦官专权的问题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，于是在讲解此诗所涉及甘露事变时，便有了充分的铺垫，不但便于读者理解此诗，而且与白居易“中隐”的仕宦态度融为一体，行文文畅旁达、流通自在。

严肃活泼的文风

虽然该书着重解读的《长恨歌》与《琵琶行》，都是众人耳熟能详的篇目，但具体讲解并非泛泛而谈，而是力求有理有据、深入浅出。比如在论证“《长恨歌》的第一主题：爱情”时，除了从艺术角度分析全诗“最用力”“最出色”的部分，还采用了最原始也最具说服力的数据统计法，通过对比《长恨歌》四大段文字中爱情描写的篇幅多寡，最终得出“从全诗篇幅分配来看，白居易显然更重视爱情主题”的结论，可谓单刀直入、切中要害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回归并还原被人为复杂化的事物本真，本身就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。再如书中对《琵琶行》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一语中品服问题的探讨。据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记载，五品官阶的江州司马可穿浅绯色官服，唯有八品、九品官员才穿深青、浅青色官服，为何白居易会“青衫湿”？该书考证认为，唐代官员服色依据的是“阶官”，而非“职事官”：江州司马虽为五品职事官，但白居易当时的阶官是从九品下的“将仕郎”，级别几乎是最低的，因此自然该着青衫。这种基于文献记载的严谨解读，既让白诗更具历史厚重感，又将读者容易忽略的细节专门拎出剖析，往往能让人耳目一新。

破译赋体文学的文化密码

□王思豪

约百年前，当文学史研究领域出现对赋体文学价值的质疑之声时，郭绍虞先生于1926年撰写的《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》（载《小说月报》1927年）一文，首次系统论证了赋体文学的嬗变轨迹与文学史坐标。这篇文章在赋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，被学界公认为现代赋学研究的奠基性成果。新世纪以来，赋学研究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拓展趋势。随着《中国文化史论纲》《中国文化制度述略》《中国文化史二十讲》《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》《赋学：制度与批评》等著作的相继出版，赋体文学与中国文化制度的深层关联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。在日前出版的《大汉天声：赋与中国文化》（以下简称《大汉天声》）一书中，作者构建起赋学在文化史上的价值定位体系，并为该领域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。

赋体铭刻“大汉”的文化精神

“大汉”既指向汉代这一中国历史上首个长期稳定的大一统帝国，更象征着中华文化基础格局的形成。将汉赋誉为“一代文学之胜”，不仅印证了“汉之赋周秦所无”的历史评价，更彰显了汉代在文化领域的开创性贡献。可以说，“大汉”承载了一种文化精神，深深渗透于华夏民族的世代传承之中。

在《大汉天声》一书中，赋体被定位为汉代国家形象的文学书写，凸显其“体国经野，义尚光大”的文化政治功能。书中第一章聚焦汉赋的建德问题，延伸出“大汉继周”的历史思考，进而追问汉承秦制背景下的“王霸之争”路径，并梳理了汉赋关于郊祀、畋猎、朝贡等“天子礼”的仪式化描写。第二章切入汉赋经典的形成历程及其与汉代显学、经学的深层关联，提出“赋圣丹心”说，重新解读司马相如“凌云笔”背后的文化策略。到第四章“江山一统，气象万千”，论述视角由汉而下，梳理魏晋、唐、宋辞赋创作的“时运与文心”。随后又从“行人之官”的职能与赋体功能视角，探讨外交用赋的文化现象。

《大汉天声》以跨学科的研究视角，为理解中国文学与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范式，从独特的角度重构了汉赋的文化定位：它不仅是“一代之文学”，更是解码秦汉时期文化认同形成的关键密码。

赋体传播盛世的华章

“天声”喻指汉代的威仪与正统性，汉赋中描写的天子郊祀、畋猎等礼仪，皆以“明天子之义”为核心，象征汉王朝“承天之序”的合法性。如扬雄《河东赋》追寻天子祀礼的深意，既上溯“虞氏”“帝唐”“隆周”“幽岐”等所谓“往昔之遗风”，又梳理尧、舜、周文的治道传统，着重凸显郊祀所蕴含的政治内涵。

作者在研究中主要抓住了三个关键节点：其一，从《文选》编纂反观汉赋，厘清“盛世作赋”的文化传统。《文选》首重赋体，而赋体中又以“京都”类为首选，通过赋体“宏博之象”，以“不可加”的自信彰显盛世作赋的情怀。张衡创作《二京赋》，既模仿班固《两都赋》，又力求超越。晋代左思撰写《三都赋》，唐代李庾作《两都赋》，这些京都赋的共同旨趣，皆围绕天子“君临四海”的理想展开，借京都礼仪秩序彰显盛世的华章。其二，科举考赋制度推动辞赋传播。从司马相如献赋汉廷、扬雄奏赋言事，到唐代闹场纳入考赋，正式开启唐宋“诗赋取士”制度。其三，《盛京赋》的创作与译介，让辞赋走出国门、走向世界。

“大汉天声”四字浓缩了中国赋学的核心价值——以赋体这种宏丽的文学形式彰显国家气象，并通过礼制书写与艺术创新，使赋体成为“经世不衰而历久弥新的独立文体”。《大汉天声》一书不仅从政治与历史维度系统重构了赋体的价值坐标，更通过对其书写范式的深入解析，清晰阐明了赋体文学承载中国精神传统的永恒魅力。

重新审视赋体的历史价值

赋体作为“以语象呈现物态的审美文献”，既能宣扬国家的成就与美德，又是一种蕴含中国文化精神、展现中国形象的文类。在作者看来，“文类”一词中的“文”指向修辞艺术，“类”则源于文化重“类”的特质，而赋体尤擅博物叙事，故更偏重文化属性。作者以《上林赋》与《上林图》为例，认为“上林苑”作为皇家苑囿，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以“周览泛观”的笔触，尽显赋体“控引天地”的想象特质。书中还通过解析历代牛赋文学作品、牛图视觉透视及牛图赋的

《白居易十讲》中还有一处活泼轻松的行文值得一提，那便是对元稹与白居易情感世界的剖析。书中第一次提及白居易与湘灵的情感故事，主要是为了论述白居易“深于情”的特质是其创作《长恨歌》的必要条件，还详细解读了湘灵以“锦裘绣为里”的鞋子寄托情感的细节。第二次提及湘灵，则是为了与元稹自传体小说《莺莺传》中的莺莺相对比，通过解读白诗《潜别离》与元稹《离思》组诗，认为“元稹即使不算是‘薄幸’，至少可说是不如白居易那样一往情深”。这些讲解既源于元、白二人的诗作原文，又贴合读者兴趣，尤其是解读元稹“取次花丛懒回顾，半缘修道半缘君”时，行文轻松幽默却又合情合理，在经典解读与普及传播之间实现了平衡。

经典流传的密码

正如莫砺锋先生所言：“高超的艺术水准会使读者由衷钦佩，但不能使读者深受感动。感动读者的唯一因素只能是作品中蕴含的情感。”（第五讲《琵琶行》为何感动我们？）事实上，好的作品之所以能持续打动读者，除了作品本身蕴含的情感，更离不开后世读者在解读与传播过程中所倾注的纯真真挚之情。唯有如此，情感传递的链条才能延续，经典作品方能流芳百世。

“深于情”的白居易，其情感抒发从不局限于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更涵盖了广义上的仁爱之心，而其中最鲜明、最重要的，便是对人间正道沧桑的关切。也就是说，唯有秉持正论，方能真正打动人心。该书第四讲围绕“白居易对社会的关切”展开，重点论述了他的讽喻诗。这类作品虽为白居易本人极度重视，但在其所处的时代，人们已更偏爱其闲适、感伤类诗作，后世读者亦是如此。因此，该书为讽喻诗设专章探讨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从文学层面来看，讽喻诗的艺术性虽不及闲适诗与感伤诗，但它的价值在于批判之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例如，白居易在《道州民》中赞颂道州刺史阳城停止向朝廷进贡矮奴的德政，这正是他“深于情”的生动体现。若非如此，换作冷漠无情的统治者，又怎能体会到下层人民“父兄子弟始相保”的欣慰与喜悦？“深于情”不仅是白居易的性情流露，更是该书核心的情感价值取向。唯有深爱人间、坚守正道的读者，才能与白居易惺惺相惜、引为知己；也正因如此，对《立碑》《买花》等讽喻诗的解读与重温，才不会因年代久远而使其丧失生命力。

《白居易十讲》的文字衔接流畅自然、恰到好处。全书不仅囊括了有关白居易的题中应有之义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字里行间处处彰显着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呵护，展现出作者本人谦谦温温的君子之德和刚毅近仁的学者风采。

（作者系泰州学院人文学院讲师）

编辑手记

结识郭宝平老师，缘于编辑他的上一部作品《范仲淹》。不同于市面上部分戏说历史的读物，郭老师笔下的范仲淹，既有朝堂议政的果决，也有夜读时的疲惫，就连批改文书时笔尖停顿的细节，都透着真实的质感。他常说：“写历史人物，得让他们站在地上说话，不能飘在云端当偶像。”正是这份“不戏说、不胡说”的坚守，让我对他的文字产生了信任。因此，当郭老师提出要创作《苏东坡》时，我第一时间便想起了《范仲淹》中那份直击人心的文字温度。

苏东坡的故事早已被反复演绎，既是不少作家的热门选题，也是网红视频的常青内容，即便在当下，他依然是互联网上热度不减的“大IP”。但郭老师想做的是剥离其“大文豪”的光环，还原一个“五位一体，一体两面”的鲜活之人。他既是官人、幽人、野人、仙人，亦是哲人。既有官员的担当，也有文人的清醒。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东坡文化产品，郭老师始终坚持：“写历史不能凭感觉，也不能为了流量而夸张，错了就是对读者不负责。”这份较真的创作态度，恰好和我对历史传记的期待不谋而合。

一个“不完美”的理想主义者

苏东坡少年时代想做“野人”。那时在眉山，他常逃学至乡野之间，观察农耕之景，静听竹间雨声。后来通过科举入仕，他成为一名“官人”。在凤翔担任签判期间，他经历了与弟弟苏辙的首次分离，还受到长官的诸多约束，这让他初次体会到不自由的滋味。他的个性与气质本就不适合官场，直言敢谏的作风以及反对党争的态度，使他在政坛中实则成为“自由派”，也因此不幸身陷乌台诗狱，沦为困顿的“幽人”。此后他屡遭贬谪，在惠州躬耕劳作，在惠州寄寓度日，在儋州参禅悟道，写下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”的词句，饱尝放逐途中的孤独。但他并未甘心做一名“幽人”，在心理上始终认同“野人”与“仙人”的身份，以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豁达笑对人生风雨。后来他不断探索超越性的人生意义，最终淬炼成一位“哲人”——在赤壁矶头凝视江水时，他从奔流不息的自然景象中感悟时空流转的本质，消解了对生命短暂的焦虑。在风雨途中前行时，他于泥泞与晴空的交替里，勘破了境遇顺逆的虚幻。

在北宋党争最激烈的30年里，苏东坡始终是个“异类”。王安石变法期间，他上书直言新政对百姓的盘剥之弊，被新党斥为“守旧”。司马光复辟后，他又据理力争新法中利民条款的合理性，遭旧党骂作“反复”。这源于他对权力天然的怀疑与抗拒，但凡当权者极力推行的举措，他总会保持批判态度。也正因如此，他在朝廷任职时总觉“如在樊笼，如在泥沼”。

书中有个情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：担任杭州知州时，苏东坡发现湖沼淤积严重，若不及时疏浚，终将被淤泥完全侵占，百姓也恐遭钱塘湖水之患。于是他力排众议启动疏浚工程，为说服朝廷四处巡视，还不时与夫役一同劳作，挥汗如雨。作者在此处特意加入了同僚选择的对比：有人对疏浚事宜视而不见，有人因惧怕越权而避事不办，有人担心与监司产生对立令朝廷为难，私下劝苏东坡“且待来年，避避风头”……唯有苏东坡不惧怨怒，在奏折中始终紧急禀明“水旱盗贼、鳏寡孤独”等民生疾苦。这些鲜活的叙述与鲜明对比，让我们更深刻地读懂：苏东坡的“异类”，恰恰在于他始终把民生疾苦放在心上。这份不计个人得失的坚守，正是赤子之心在权力场中最耀眼的光芒。

官场的苏东坡，是其他同类图书较少深入挖掘的内容。该书收录了大量朝堂奏对相关材料，在校对、编辑及讨论书稿的过程中，作者多次提及：“史料钩沉并非易事，做这件事十分辛苦，但我觉得，若是我做，恐怕也很少有人会做了。”这份较真与坚持，让书中苏东坡的每一次身份转换都有了坚实的史料支撑。

仕宦沉浮虽打磨了苏东坡，却未曾将他打垮。可以说，苏东坡一生中五重身份的交融与变换，正是作者希望如实传递给读者的核心内容。在这里，读者能看到一个褪去“文豪滤镜”的苏轼：他会因仕途失意而苦闷，也会因人间烟火而雀跃，既像邻家长者般鲜活亲切，又闪烁着穿越时空的哲学光芒，让“人间清醒”的东坡形象变得可触可感。

藏在日常琐碎里的东坡本色

作者在书中毫不避讳地刻画了苏东坡的“脆弱时刻”，更向我们展现了他度过艰难岁月时的达观与开朗。贬谪黄州期间，他坦然说道：“一家人得以团聚，虽

「我成为我，我宁做我」

□黄如嘉



《苏东坡（全二册）》，郭宝平著，凤凰出版社，2025年6月

说生计窘迫，但终究比黄州的普通百姓好过些。我每日迎着晨风、披着月色，拄杖着履，或垂钓、或采药、或闲游，归家后听朝云抚琴，还能饮到清冽新鲜的长江水，又有什么可发愁的呢？”离开黄州时，他更是眷恋地说：“我的儿孙已满口楚语吴歌，黄州便是我的家！”在惠州，即便内心满怀忐忑，他仍乐观地期盼：“我急着品尝惠州的荔枝与朱橘，也盼着到罗浮山效仿抱朴子修道呢！”抵达儋州后，苏东坡父子被逐出官舍，只能在椽木林的破草棚中栖身，他却感慨道：“昔日在京城上朝时，身上虽环佩玲珑，反倒像戴着枷锁；如今居于草棚，晨起梳头、午间小憩、夜晚濯足，日子越是艰苦，便越要坚持。旁人越是想置我于死地，我就越要坚强地活下去。”

更令人动容的，是他在琐碎日常中始终坚守初心的模样。作者写到，苏东坡在惠州开垦东坡时，会因几株秧苗被邻里的鸡啄食而与人争执，转头却将新收的稻谷分一半给对方。在杭州疏浚西湖期间，他会与反对者据理力争，待调任之际，又特意为对方饯行，陪着游赏焕然一新的西湖，以此化解往日心结。甚至在创作《赤壁赋》的那个月夜，他起初还惦记着“酒不够喝”，后来才生出“哀吾生之须臾”的深沉感慨。这些鲜活的细节，让苏东坡从历史课本中走了出来，变成了我们隔壁那位虽有固执、有些较真，却始终怀揣善良本心的邻家之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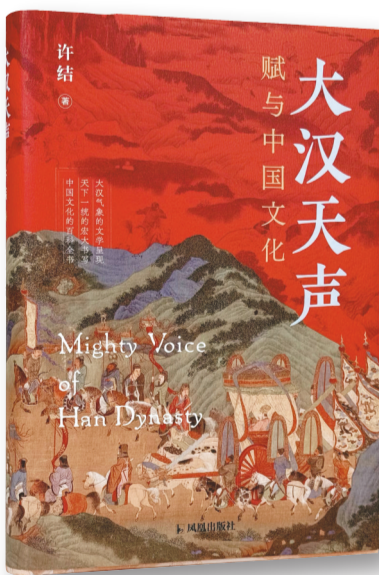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今天仍需要苏东坡

在编辑过程中，我常常自问：信息过载的当下，我们为何还要读这本《苏东坡》？答案就藏在作者笔下。该书以朴实的文笔、热忱的态度，还原了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。无论是他始终秉持的“赤子之心”，五重身份交织背后的人生智慧，还是在宦海浮沉中坚守的“为民为国”初心，苏东坡都向我们示范了人如何在“不得已”的境遇中主导自己的生活，在“不平静”的世事里坚守本心，在“不圆满”的人生中找到精神坐标。

我们之所以需要这样的苏东坡，不仅因为他是名垂青史的大文豪，更因为他在困顿时的抉择、在琐碎生活中的坚守，宛如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我们自己。他所经历的“不得已”“不圆满”“不平静”，正是引发当今读者深度共情的锚点。生活难免有裂缝，而苏东坡选择让光透进来，选择在困境中成长、与世界和解，这正是他触动当代人的心灵共鸣之处。

作为编辑，我能做的，便是将这份真实传递给读者，连同作者对史料的较真态度与对人物的温情刻画。褪去“偶像包袱”的苏东坡，是永远活在时光里的同行者。读懂这样的他，我们也终将学会在自己的时代里，坚定地“成为我”，勇敢地“宁做我”。

（作者系凤凰出版社编辑）



《大汉天声：赋与中国文化》，许结著，凤凰出版社，2025年7月

跨媒介互文，揭示农耕精神从文本到图像的三重转换机制，为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典型范式。

在《大汉天声》的学术建构中，赋体作为“文化密钥”的价值正被重新发掘。它不仅是文学演进的载体，更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表述、历史观建构与艺术脉络的核心媒介；其繁复的空间叙事，对应着王朝秩序的力量想象；夸饰的物象罗列，暗含着“万象毕照”的艺术生产逻辑。正如《大汉天声》所揭示的，学界需重新认识赋体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：那些曾被简单归为“宫廷文学”的汉大赋，实则是破译“中国性”最为精密的文化认知密码。

（作者系澳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）



凤凰出版社

凤凰出版社
微信公众号二维码